

書名：《百年傳承：香港學者論中華書局》

作者：周佳榮

出版社：中華書局

出版日期：2012 年 7 月

頁數：400 頁



多年前，筆者曾讀海外中國學專家芮哲菲的著作《古騰堡在上海——中國的印刷資本主義（1876—1937）》，卷首有這樣的描述：

1949 年 3 月，當毛澤東從西柏坡起身前往北京的時候，曾攜帶四部書，包括《史記》、《資治通鑑》、《辭源》（由商務印書館於 1915 年開始印行）和《辭海》（由中華書局於 1936—1937 年開始印行）。如果說前兩部書是古往今來帝王將相和征服者必讀之經典，那麼後兩部書則彰顯了中國近代工業化的出版企業之於知識和政治的重要性。商務與中華，和其他以上海為基地的新式印刷和出版企業一道，塑造並標準化了近代中國的語言和思維方式。<sup>[1]</sup>

商務印書館乃近代中國出版業之濫觴，中華書局繼起，進而發展成為與商務印書館齊名的新式出版企業。有學者指出：“如果說，1897 年成立的商務印書館是戊戌維新的產物，那麼，中華書局就是辛亥革命的產物。”<sup>[2]</sup> 辛亥革命誕生了一個新的國家政權，也誕生了民國時期第二大出版機構——中華書局。

它的出現,使近代“出版領域從一家的一枝獨秀,發展到兩家的分庭抗禮,意味著近代出版業激烈競爭機制的正式形成。中國的出版格局爲之一變”<sup>[3]</sup>。

民國時期的商務印書館與中華書局,始終存在競爭、互補和互動的關係,共同締造了出版文化興盛的局面,兩者的重要性是不可偏廢的<sup>[4]</sup>。然而,有關商務印書館的專著、論文等研究成果可謂蔚爲大觀,相比之下,學界對中華書局則缺少足夠的關注。2012年,在中華書局成立100周年之際,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周佳榮教授主編的《百年傳承:香港學者論中華書局》一書在香港中華書局出版,彙輯了一批香港學界精英對中華書局的研究成果,實爲中華書局研究中具有開拓意義的一部力作。該書既有中華書局作爲出版文化機構的歷史、人物研究,更力圖從百年來中華書局的各類出版物中,發現時代議題,探討其在推動中國文化教育的現代化及對繼承和弘揚中國文化的作用,顯示了近代新式民營出版企業對近代中國問題研究的重要性以及他們對知識生產和中國近代文化形成的價值和貢獻。

## 二

1912年元旦,中華書局在上海成立,2月22日正式營業。營業翌日,創辦人陸費逵便在《申報》發表《中華書局宣言書》,闡明創辦中華書局的原因:“立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實在教科書。教育不革命,國基終無由鞏固。教科書不革命,教育目的終不能達也。”他痛斥專制政體對“自由真理、共和大義”的束縛壓抑,並將教育革命與國家大義聯繫起來,希望藉由教科書革命傳播民主思想、澆灌自由之花,以期“禹域日進于文明,華族獲葆其幸福”,體現了中華書局初創者的文化自覺。他宣佈創辦中華書局的宗旨有四:“一是養成中華共和國國民,二是並採人道主義、政治主義、軍國主義,三是注重實際教育,四是

融和國粹歐化。”<sup>[5]</sup>，彰顯了中華書局意欲溝通中西文化，通過教育改良文化、塑造國民以至強國的理想。

對於中華書局創辦人的這些舉動，香港學者紛紛指出：“陸費逵發表以上宣言書並非偶然，中華書局的四大宗旨，建基於陸費氏在書局成立前，對辛亥革命形勢的估計和未來共和國教育需要的認知上。”<sup>[6]</sup>這樣的分析和評論，切中要害。武昌起義爆發後，商務印書館的掌門人張元濟思想傾向保皇，認為“革命必不能成功，教科書不必改”。與此相反，陸費逵集資 25 000 元，與戴克敦、陳寅等人在家夜以繼日地秘密編輯共和教科書，後來《中華教科書》一經出版，便迅速佔領了市場，搶得先機。為此，蔡思行進一步指出，“中華書局的成立，正切合 1912 年中華民國共和政體的建立，需要適合共和政體新型教科書的歷史大勢”<sup>[7]</sup>。事實上，正是民國初年中華書局出版新式教科書的巨大成功，奠定了其歷史地位。

民國時期的中華書局，肩負起“開民智”的重任，先後出版辭書、工具書、文學、歷史、哲學、宗教、音樂、藝術、政治、外交、經貿、金融、自然科學、醫藥衛生、工程技術、農林畜牧、教育學著作、各類學校教科書、教學專著及參考書、普及知識和青少年讀物等各類圖書、叢書叢刊 6 000 餘種，其中還不包括整理重印的舊籍。在出版物中，以教育類最多，當中主要是中、小學教科書，其次是語言類和文學類，再次為史地類、藝術類、經濟類、自然科學類、政治法律類。中華書局出版的教科書，在民國時期的出版界是居於首位的；該局的社會科學和文藝書籍，約占其出書總數的一半<sup>[8]</sup>。

對於中華書局取得的這些成就，該書作者多持肯定的態度。更難得的是，梁偉基以陳君葆日記為主要材料，勾勒出 1930 至 1940 年代中華書局香港分局（以下稱港局）的情況，包括主事者之背景出身，港局與中國軍政界、文化界人士之接觸與交流，以及日占時期港局的遭遇等<sup>[9]</sup>，從而豐富了人們對港局的認識和

了解,形成與內地學者的學術對話。

那麼港局究竟經歷了怎樣的發展過程呢?周佳榮進行了詳細梳理:1927年中華書局在香港設立分局,1933年在香港九龍建印刷分廠。1937年抗戰開始後,陸費逵於11月赴香港設立香港辦事處。翌年上海印刷所停業,有10餘人到香港印刷廠復工。1941年7月9日,陸費逵在九龍逝世。1950年中華書局在香港設海外辦事處。1980年,中華商務聯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成立。1981年,三聯書店·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香港總管理處成立。1988年7月,中華書局香港分局在香港註冊,成立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同年9月1日,聯合出版(集團)有限公司在香港成立,擁有15家成員機構,包括中華書局等。這為內地和海外讀者了解港局的歷史以及中華書局的百年歷史,確實可以起到導引的作用。

袁振華、曾潔與陳澤林等人還注意到港局致力推廣普通話、國學等之於文化的貢獻。袁振華和曾潔從中華書局出版的普通話教育書籍入手,考察港局在香港推動普通話的歷史過程。作者指出,從出版的普通話教育系列書籍來看,無論是承載豐富漢語文化內涵的漢語辭典工具書、推陳出新的實用普通話教科書,還是貫徹普通話教學理論實踐的普通話測試輔導書,針對港人學習普通話重點、難點的普通話學習方法叢書,都從不同層面、在不同程度上驗證和推動了普通話教育觀念的更新和轉變。嶄新的教育思想理念需要切實的文化載體,書籍出版就是幫助新的文化知識進入尋常百姓家的重要橋樑<sup>[10]</sup>。這樣的評論既中肯又到位。

陳澤林認為港局相對於國內中華書局,對國學的職責不是重於保存,而是重於如何推廣。他從出版物的數量和內容兩個層面分析港局在文化生產和傳播中的角色,指出從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末,國學類書籍占出版總量的比例逐年增加,其數量在30年間上升近8倍,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國學在港日漸重

要。另外，從同期出版的叢書來看，最初以中小學生為讀者對象，推出簡單易讀的“中華通俗文庫”及“中華文庫”；20世紀70年代，陸續出版“文學與歷史叢書”、“中國知識叢書”，並翻印內地版“古典文學普及讀物”，程度有所提升。這不但“顯示出香港人國學知識的普及情況”，而且反映了港局“在這段時期針對港人國學知識而所行的策略”<sup>[11]</sup>。

羅永生與許振興則分別以中華書局點校本《唐六典》和《中國史學基本典籍叢刊》為例進行評析。羅永生對《唐六典》的版本與流傳、中華書局版《唐六典》的編纂背景、內容結構、史料價值及編輯缺憾給予詳叙<sup>[12]</sup>。許振興則對《中國史學基本典籍叢刊》中有關宋史研究的書籍，特別是其中的“箋證”新著《宋季三朝政要箋證》進行介紹，並認為文獻整理與相關學術研究互動配合無疑應是整理古籍——特別是整理所謂“次要典籍”者可以考慮發展的方向<sup>[13]</sup>。

憑藉這部書，筆者和廣大讀者一起領略了中華書局的百年芳華。對於內地和海外讀者來說，港局的歷史變遷及其貢獻顯得尤為值得珍視。

### 三

教科書既是中華書局進軍近代出版業的敲門磚，又是其突出特色，因此引起香港學者的格外關注。姚繼斌和區志堅兩位學者不約而同地將目光投向民初的教科書，並展開各具特色的分析論述。姚繼斌肯定了教科書傳播知識和文化的作用，因為“教科書，自從有現代教育以來的一個世紀，代代相傳，每個讀過書的人沒有不受其影響的，在潛移默化間，它塑造千百萬兒童的靈魂，民族意識賴以傳承……教科書的本質是民族文化，即民族精神賴以傳承的重要工具之一”<sup>[14]</sup>。故而，“通過近代教科書去檢討中國近代的文化現象、社會意識，往往能給人一種更為

客觀、真實的認知和啓迪,這種思考是超越了教育史研究範疇的、領域更爲廣泛的探索”<sup>[15]</sup>。

姚繼斌對中華書局出版的歷史教科書進行了梳理,進而指出:中華出版的歷史教科書首先摒除了傳統歷史教材和清末教科書無學制限制、無教法要求、未把握深淺程度、忽略中國兒童特點、忽略中國教育內容的舊弊。其次切合時代和學生所需,以培養民國國民爲目的,重視國史的“君權民權之消長”和“文化之進退”,重視文化發展(如種族、中外交通、政制等事),又強調略古詳今,讓學生知道最近“世界大通之情勢”<sup>[16]</sup>。再次,致力於推動民族主義教育,旨在“喚起民族的自覺;闡發三民主義之歷史的依據;由過去的政治社會,認識現代政治社會之所由形成,以爲因應之方針;明了本國外國古今文化的演進,以策進國民在文化上的努力”<sup>[17]</sup>。由是觀之,中華書局歷史教科書的編者們重視新知識、新文化的傳播,重視學生民族精神養成的編輯策略,不僅是對傳統歷史教育知識系譜的重構,而且對歷史文化教育的功能進行了重新思考和定位,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

區志堅深入發掘《中華女子國文教科書》內的女性“國民”形象議題,試圖通過編者對性別議題的表述,透析民國初年中國文化發展的真實樣貌。他指出辛亥革命以後,中國走向共和政體,昔日的臣民轉變身份成爲國民,在教科書的教育功能之外,學者更分別從傳承及改良中國已有文化價值的角度,編寫新式教科書<sup>[18]</sup>。這是民國時期一個相當值得關注的文化現象,從教科書內容的演變,言及由此帶來的知識系譜和知識結構的變動,進而從宏觀的角度討論傳統與所謂“進步”的關係,不僅反映了中國本土知識界的“個別性”與代表全球化“普遍性”的“進步”觀念之間的互動<sup>[19]</sup>——中國經驗對世界現代化浪潮的回應,同時反映了當時的知識分子力圖調和中西文化的大膽嘗試。

衆所周知,近年來民國時期的教科書研究已經受到內地文化史學者的普遍關注,研究成果不斷湧現。可惜的是,在這“衆

聲喧嘩”中卻很少聽到香港學者的聲音。這部書的出版多多少少彌補了這些遺憾，讓筆者和內地及海外讀者真切地聆聽到香港學者這方面的高論，豈不暢快！

與教科書同為中華書局發展重點的期刊雜誌也得到學者們的青睞，趙雨樂和周佳榮等學者分別撰文加以探討。趙雨樂從《大中華》雜誌談起，認為中華書局既從商業角度謀求銷路，亦從文化層面考慮教育改革的雙綫原則，是得到文化界認同的。透過中華書局出版的《中華教育界》等“八大雜誌”，可以看到其面向各界讀者進行雜誌編輯、發行業務的設想及實踐，涉及政治、文化、教育、實業、兒童、學生、婦女等重要議題，反映了其“從最廣泛的讀者階層，推拓至適切於中國的改革方案”<sup>[20]</sup>，並將其作為啟蒙社會大眾的文化手段等深切思慮。

周佳榮認為，近代中國出版文化的發展與書店同時編印雜誌是息息相關的，雜誌對出版社的其他出版物起了宣傳、推廣和促銷的作用，同時也聚集了一批作者向書店投寄和撰寫文稿，其中不少文稿得以累計成書，編印單行本，成為另一種出版物。更為重要的是，書店借著創辦雜誌的關係，與眾多作者以至各方面的專家學者保持經常而密切的關係，編輯們在物色著書人選時，更是如魚得水、知所取捨<sup>[21]</sup>。這樣的見解，非研究經年，確有心得的學者是無法提出的。類似的真知灼見在書中還有很多，等待著讀者們去發現。

## 四

香港學者圍繞中華書局百年歷史的討論，涵蓋了相當豐富的議題，呈現出耐人尋味的百年圖景。借助他們的獨特視角，我們得以窺見知識生產之於時代和文化的獨特魅力。以中華書局為個案，進而擴至整個近代民營出版業，探究他們與近代文化的互動關係，出版家的出版理念、其賦予出版物之文化價值，以及

出版業的發展動力等問題,對於今天的出版界,乃至文化界來說,應當是不無裨益的<sup>[22]</sup>。相信隨著研究的不斷發展,該領域將會有更多優秀的學術成果問世。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 侯 杰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 徐世博

注釋:

- [ 1 ] Christopher. A. Reed: *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 - 1937*, Canada: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4, P1.
- [ 2 ] 周佳榮:《中華書局與民國時期“書店期刊”的風行》,周佳榮主編:《百年傳承:香港學者論中華書局》,香港:中華書局,2012,頁265。
- [ 3 ] 王餘光、吳永泰:《中國出版通史(8)·民國卷》,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8,頁27。
- [ 4 ] 同注[2],頁276。
- [ 5 ] 《中華書局宣言書》,《申報》,1912年2月23日。
- [ 6 ] 蔡思行:《時代的追憶——不同的“我”與中華書局》,周佳榮主編:《百年傳承:香港學者論中華書局》,頁32。
- [ 7 ] 同上,頁34—35。
- [ 8 ] 張召奎:《中國出版史概要》,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頁203—204。
- [ 9 ] 梁偉基:《中華書局香港分局史略——據《陳君葆日記全集》所載》,周佳榮主編:《百年傳承:香港學者論中華書局》,頁50。
- [ 10 ] 袁振華、曾潔:《國語南漸 中華推普——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的普通話教育書籍》,周佳榮主編:《百年傳承:香港學者論中華書局》,頁260。
- [ 11 ] 陳澤林:《國學南來,靈根植樹——1949年後中華書局在香港傳播文化知識初探》,周佳榮主編:《百年傳承:香港學者論中華書局》,頁225。
- [ 12 ] 羅永生:《中華書局點校本《唐六典》的特點與史料價值》,周佳榮主編:《百年傳承:香港學者論中華書局》,頁226—237。



- [13] 許振興：《文獻整理與宋代研究——〈中國史學基本典籍叢刊〉的啓示》，周佳榮主編：《百年傳承：香港學者論中華書局》，頁 252。
- [14] 汪家熔：《民族魂——教科書變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頁 226—227。  
轉引自姚繼斌：《中華書局和歷史文化教育：以教科書為中心》，周佳榮主編：《百年傳承：香港學者論中華書局》，頁 211—212。
- [15] 周其厚：《中華書局與近代文化》，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45。轉引自周佳榮：《近代圖書文化的開展——中華書局出版物述要》，周佳榮主編：《百年傳承：香港學者論中華書局》，頁 127。
- [16] 姚繼斌：《中華書局和歷史文化教育：以教科書為中心》，周佳榮主編：《百年傳承：香港學者論中華書局》，頁 204。
- [17] 同上，頁 207。
- [18] 區志堅：《建構“男勤於外，女亦勤於內”的女性“國民”——陸費逵的教育思想及〈中華女子國文教科書〉》，周佳榮主編：《百年傳承：香港學者論中華書局》，頁 140。
- [19] 同上，頁 179。
- [20] 趙雨樂：《民國共和體制的抉擇——從梁啟超主編〈大中華〉雜誌說起》，周佳榮主編：《百年傳承：香港學者論中華書局》，頁 313。
- [21] 周佳榮：《中華書局與民國時期“書店期刊”的風行》，周佳榮主編：《百年傳承：香港學者論中華書局》，頁 276。
- [22] 周其厚：《中華書局與近代文化》，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237。